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教育篇

纵论教育改革开放40年,顾明远先生对话许美德教授

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意义在哪里

本报记者 刘华蓉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与明远教育书院日前联合邀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许美德就中国改革开放40年展开对话,并就中国教育改革及其全球意义进行深入交流和讨论。

40年带来了教育事业的繁荣

顾明远: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是观念的转变,第二是事业的发展,第三是制度的创新,第四是科学的繁荣。

首先是观念的转变。改革开放不是那么容易,一开始很困难,最困难的就是观念的转变。40年来,观念的转变正逐渐深化,比如,从为经济建设服务,到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这个观念的转变很不容易,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其次,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目共睹。我们用了20年时间,有了九年义务教育,这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底子很薄,教育的发展全靠全国人民的支持。

再其次是制度的创新。40年来,教育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建立起来了,教育法律体系也逐渐完善了,颁布了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这是制度方面的创新。

最后是教育科学的繁荣。过去,曾经一本《教育学》统天下,这几十年来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拿比较教育来讲,以前几乎没有比较教育,一开始叫外国教育,改革开放后才把各个国家的教育学引进来,加以比较,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育科学的繁荣,还体现在我们今天的教育科学研究不仅停留在大学的课堂和实验室里,而且走到了基层。

许美德:我1978年到中国,现在刚好40年。这些年里,有两个人让我非常难忘。其中一位是复旦老校长谢希德教授。中国一改革开放,我就申请来中国,到大学当老师。那时候复旦大学的校长是谢希德教授,她特别热情地欢迎我,请我到她家做客。

另外一位是西北师范大学的李秉德教授,他之前在农村小学教了好几年书,但不以为苦,反而觉得在小学真正能够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改革开放初期,他已经快70岁了,但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40年来我最难忘的,就是能够有机会与这样的中国学者和教授有很亲密的来往,而且看看他们的人生和工作态度,对我真正的启发。他们经过那么多苦难,年纪很大了,仍全力支持改革开放,努力培养下一代青年。

此外,最难忘的一件事和顾明远先生有关。上世纪80年代,加拿大和北师大合作开展了博士培养工作,互派博士生到对方进修。中国派了22个博士生和教师,加拿大派了15个。中方当时负责整个组织工作的是顾明远先生,因为他做了很多工作才使得这件事情做成。当年到加拿大进修过的中国学者现在都是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和骨干了。

顾明远:这40年里最重要的教育事件就是高考。知识改变命运,高考不仅改变个人命运,也改变了国家命运。恢复高考以后,读书无用论一扫而光了,为今天国家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顾明远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许美德(Ruth Hayhoe)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曾任香港教育学院院长

许美德:我觉得中国这40年能够得到这么快的发展,第一个因素是儒家文化的传承,第二个是因为有非常明确的国家发展策略,有很多很有学识、能力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在推动,这样有领导力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顾明远:这40年坚持了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特别强调继承自己的东西,在教育上首先就是重新提倡尊师重教。此外,我们强调学生要打好基础并强调德育为先,培养学生成为有高尚品德的人,这都是我们的好传统。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个文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所以我们的发展也应该是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的。

许美德:我也觉得继承过去的经验非常重要,我从1985年开始访问中国的大学,去了大概200多所大学,还收集了100多所中国大学的校训。不同地区的大学有不同的经验,有一定的自主权,凡事考虑本校的历史、本校的特点和情况,这点很重要。所以,今天很多中国大学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为有自己的传承和历史。

40年促进了教育的国际交流和相互理解

许美德:我一直有一个看法,西方应该学习中国。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研究教育一定要到中国来。1992年,我回加拿大组织了一个国际会议,谈跨文化趋势,出经费请中国的学者,也请了印度和中东的学者。我不主张文明冲突,而是强调文化对话。1994年,这个会议在中国的岳麓书院召开,也请了北美、印度、中东的学者到中国来。那个时候西方很多学者还不愿意到中国来,但改革开放40年让更多西方人对中国及其文明更加重视并且都愿意来中国了。

顾明远:中国教育有五千年的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很快,但是国外知道的很少。我在国外经常讲,我知道你们的教育,比你们知道中国的教育要多。现在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但是在教育方面我们还跟不上整个国家的发展形势。现在,我们首先要走出去。习近平总书记讲要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也要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其次,我们要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规则、了解国际事务的人才,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国际组织里,

中国人还不多,这跟中国的政治地位很不相称、不符合,所以我们的教育肩负着很重要的使命。

许美德: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大学应该开始考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学校和大学的发展。不少中国大学主要还是向西方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这些大学看齐。有的做法比如给教师很多的压力,要求教师在某些刊物上发表论文,而不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世界上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就很多,很需要中国提供教育方面的支持。

我希望中国的大学多考虑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合作,比如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他们很希望和中国的教育学者合作。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很有前景,也很有价值,这样科学研究、教育研究都会更加丰富。

顾明远:要消除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必须坚持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人都愿意学汉语。在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一直在不断蔓延。要消除这种偏见,最根本还是中国要强大,中国强大了人家才能看得起你。随着中国的强大,中国的教育也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现在国际一流大学都到中国来争取生源,上海学生在PISA测试中夺冠,英国人就到上海请50名教师到英国教课,把上海的数学课本引到英国去。

许美德:中国重视教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有自己的教育和文化外交,这非常重要。要推进中国大学与外国机构的合作。现在,西方对中国还有很多怀疑和误解,中国教育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让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国际舞台分享的机会。

同时,现在有很多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学生来中国学习。我刚从东北师范大学回来,和五六十位发展中国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座谈了两天,看到他们非常高兴有机会在中国学习,英语、汉语都很流利,可以谈论各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硕士、博士生学好外语特别重要,如果外语不行,就不太容易把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文明和国外分享。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教育模式和标准

顾明远: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

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取得了很大成就。以后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内容很多,从教育来讲,一是要鼓励外国人来华学习。过去我们出去的多,现在来的也逐渐多起来了,比如北师大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院有国际班,都是外国学生,以后还要吸收更多来华留学生。二是要推进更加人才培养和交流,派中国学生出去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我国在制造、创造方面很多核心的技术还没有完全掌握,要多派一些人出去学习尖端的、有创新性的东西。

许美德: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经验,把西方很多先进的科技成果、其他知识与中国自己的发展结合起来,同时又坚持了独立自主。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

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学习和课题项目研究机会常常被批评是依附式的方式,是一种新殖民主义,也就是西方提供经费,但是要求来的人按照他们的学习方式。中国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互相尊重、相互合作的模式。中国的文明特别强调和而不同,可以用基于和而不同思想的合作模式来支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这在国际舞台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一点,中国很喜欢排名,因为排名常常和经费的多少有关,每一位校长都不得不注意这个事情。我非常反对这些排名,因为国际上的这种排名几乎都是西方的标准。

中国为什么不提出自己的模式标准?比如,中国可以出台全球师范大学排名,重视师范教育是体现儒家文明的重要举动,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保留师范大学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中国的实践证明,国际舞台不仅仅只有一个模式,还可以有更多模式。中国应该坚持一条自己的道路,不能完全使用西方大学的排名方式,现在只有中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40年贡献了一种不同的教育发展模式和道路

顾明远: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意义就在于,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播到世界,这是它最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最大成绩。中国文化讲和而不同,中国教育注重培养有人文精神的人,注重培养关心世界、关心人类命运的人才,注重培养为世界的和平协调发展创新的人才。

同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世界发展格局上出现的是稳定发展的中国,帮助13亿人口摆脱了贫困的中国,所有孩子都能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越来越多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中国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对维护人类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这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意义。

这些年来,中国教育慢慢探索穷国办大教育、大国办强教育的道路,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教育的多样性作出了贡献。这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意义。

许美德:我花了30多年时间研究中国的教育,最近在柬埔寨参加亚洲比较教育大会,有一些新的心得可以分享。我觉得中国教育发展的模式、中国援助其他国家的模式,和西方国家传统方式不一样,更强调相互尊重和合作,这是全新的模式,也是中国的贡献。

一家之言

大学教师要积极通过大学之声来展现其独特魅力,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传播正能量。

大学教师在新时代的历史担当

李凤营

大学教师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具备独立思考 and 批判精神,在大学从事传承、运用和创新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群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大学教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依靠力量之一,也是坚持高等教育以本为本和推动四个回归的主要践行者,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担当起独特的历史重任。

具体来说,这个独特的历史重任就是大学教师要弘大学之道、铸大学之魂,逐大学之梦、担大学之责,发大学之问、作大学之声,呈大学之美、谱大学之歌。

大学教师要弘大学之道、铸大学之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新时代的大学之道就是立足以人为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服务社会、造福人民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重点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培育满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且达到完善人生境界的公民。大学教师是大学之道的弘扬者,必须真正理解大学之道的时代内涵,这也是一名合格大学教师的光荣使命。

大学教师要逐大学之梦、担大学之责。大学是有梦想的,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新时代的大学之梦就是加速完成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积极投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大学教师是大学之梦的追逐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转化为办好中国特

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同心协力共筑大学之梦,这也是所有大学教师的强烈心愿。当前的大学之责就是以人为本,推动四个回归,提供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源源不断地提供先进思想文化、科研创新成果和高素质建设者。大学教师是大学之责的承担者,必须时刻不忘初心,勇于承担起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赋予的历史责任。这是全体大学教师的价值取向。

大学教师要发大学之问、作大学之声。大学之问是勤者之问、智者之问、勇者之问和能者之问。大学教师是大学之问的

期刊看点

教育扶贫政策执行如何纠偏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付昌奎、邹志辉在2018年第3期《教育与经济》发表《教育扶贫政策执行何以偏差》一文,提出教育扶贫的独特价值日益得到重视,政策体系初步形成,政策效益却不相匹配。通过借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对教育扶贫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分析,发现政策目标歧义与偏离、执行机制分割与乏力、执行资源短缺与低效、执行角色模糊与冲突、外部环境机遇与挑战共存,加上变量要素的连锁效应,共同形塑了执行偏差,限制了执行效益。偏差矫正的突破点在于,横向上整合职能部门权责关系、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合力,纵向上降低层级传递信息损耗、增进基层行政程序意识,同时,解除执行人员思维枷锁、强化贫困人口教育意愿并改善教育扶贫微观环境。(李孔文 辑)

攀枝花学院

以学校教育促进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

藏羌彝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璀璨明珠,非常具有代表性,但是由于区域、环境和人口等方面的原因,藏羌彝文化的影响比较有限,受众群体较少。因此,藏羌彝文化要实现扩大发展,必须坚持由近及远、以点带面的原则,把民族文化作为当地教育的一个重点,保障文化的传承性和延续性。

四川省作为藏羌彝文化的重要基地,是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实施者,所以,区域内的各级院校要及时地进行改革和创新,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和区域的需求,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和优势,针对性地去推动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攀枝花学院是攀西地区的院校,而攀枝花学院也始终以促进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为己任,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研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促进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并且其自身的经验和创新实践可以为其他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建设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成为促进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的排头兵。

成就一:

以康养文化产业带动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

藏羌彝文化产业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利地域优势,多形式、多类型地去发展文化产业。对于攀西地区来说,它是藏羌彝的走廊,地理位置优越,可以通过发展康养产业促进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换句话说就是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应该包含康养产业。攀枝花学院为了推动区域内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特意成立了康养学院,力图为攀西地区的康养文化产业服务。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攀枝花学院注重康养文化的研究和发展,一方面,从理论的层次着手,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的相关发展理论,充分结合自身的实际,去进行理论的创新,进而指导攀西地

区的康养文化产业。另一方面,组织康养学院的师生切实地参与到攀西地区的康养文化产业建设中,把理论知识充分应用到社会实践中,极大地推动了康养文化产业建设,为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

成就二:

成立康养学院为康养文化建设培养输送大批人才资源

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业,它的持续发展需要大批的高素质人才资源作为支撑和保障,而学校是人才的摇篮,学校教育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资源。在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中,具有相关文化底蕴和文化基础的人才才是极其重要的,同时,那些具有相关文化背景的新一代也是极其重要

的,因为他们是藏羌彝文化产业延伸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攀枝花学院在发展的过程中,结合区域的发展实际,以康养产业为出发点和着力点,以此来推动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这是与区域发展实际相符的。攀枝花学院专门成立了康养学院,这是该院的特色和优势所在,康养学院着重培养了康养产业方面的专业人才,在经过系统专业的教育培训之后,这些人才走向社会致力于攀西地区康养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而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也随之得到了扩展和延伸。

成就三:

指导和协调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发展

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可以为我国其他民

族文化产业建设提供经验和参考。对于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来说,其中可能面临许多的困难和挫折,而学校教育主要负责的就是文化的传输和发展,他们对于文化方面的研究和不断创新更加专业、更加有经验,攀枝花学院在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和价值,不断为区域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和发展提供指导帮助,而且也不断地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魅力,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为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藏羌彝文化产业建设,将是我国民族文化实现传承和创新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文化产业繁荣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发展,实现中国梦,民族文化产业建设是势在必行的。(攀枝花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学院 罗春秋)